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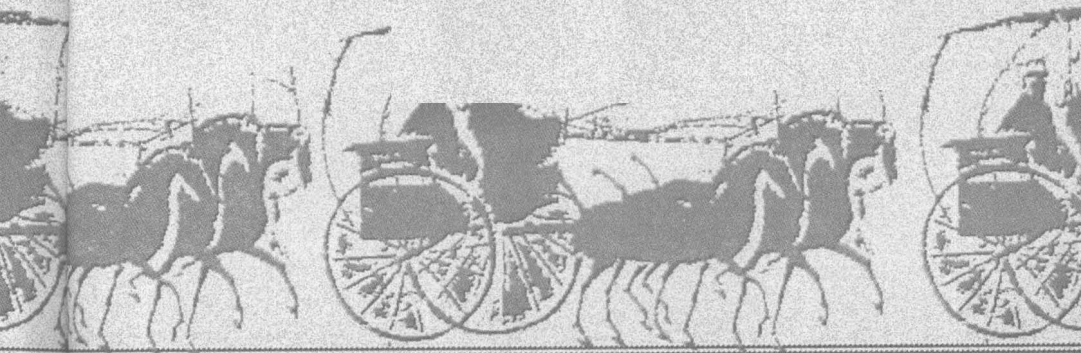
欧阳修集

「宋」欧阳修／著

沈利华

倪培翔／解评

山西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阳修集 / (宋)欧阳修著; 沈利华, 倪培翔解评. —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6.1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名家选集卷)

ISBN 7-80598-717-3

I. 欧… II. ①欧…②沈…③倪… III. ①宋词 - 选集②古典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北宋③古典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北宋 IV. I214.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3716 号

欧阳修集

著 者:[宋]欧阳修

解 评 者:沈利华 倪培翔

责任编辑:冯 潞

出 版 者: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20(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E-mail:Fxxz@sxskcb.com(发行中心)

Web@sxskcb.com(信息室)

gujshb@sxskcb.com(综合办)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运城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8

字 数:22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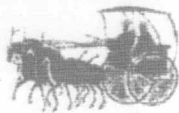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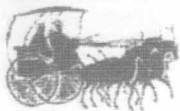


前 言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吉州吉水(今江西永丰)人,四十岁时自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是北宋杰出的文坛领袖,兼擅诗、词、文、赋的文学大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经学家。欧阳修出身于小官僚家庭,父亲欧阳观做过几任地方官。四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亲用芦荻画地教他识字,传为佳话。年龄稍长,所作诗赋文字,下笔已如成人。

欧阳修二十四岁中进士后,初仕洛阳,被任为西京留守推官,在西昆派文人、西京留守钱惟演的幕府里,与梅尧臣、尹洙等人声气相通,唱和诗歌并倡导古文,逐渐成为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是北宋中叶重要的政治人物,担任过朝廷和地方的许多官职。他有胆有识,直言敢谏,因此在仕途上几起几落,历尽波折。但由于他的政治、文学才能为朝廷所重,故又能屡贬屡起。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欧阳修被授馆阁校勘,修纂《崇文总目》。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因论事触犯宰相吕夷简,被贬为饶州(今江西波阳)知州,朝中大臣多为之鸣不平,可是身为谏官的高若讷不但不进谏诤,反而在背后诋毁范的为人。欧阳修激于义愤,写了《与高司谏书》,斥责高“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而得罪权贵,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令。仁宗庆历二年(1042)调任滑州(今河南滑县)通判。次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积极参与。庆历五年(1045),新政失败,革新派因所谓“党论”而被相继罢官,欧阳修因在年前写了《朋党论》等文,批驳“朋党之说”,为范仲淹等辩诬,因此也遭到了权奸的打击,由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降为滁州(今安徽滁州)知州,后又调扬州(今江苏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南京(今河南商丘)等地。至和年间回京任翰林学士。仁宗嘉祐元年(1056),奉使契丹。次年,主持礼部贡举,痛抑时文,提倡平实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



曾巩等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之人。嘉祐五年(1060),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由于敢说敢做,刚正不阿,再一次遇到群小的嫉恨,被诬陷为与长媳有暧昧之嫌,结果虽真相大白,但欧阳修已心灰意懒,屡次上章力辞,于神宗治平四年(1067)出为亳州(今安徽亳州市)知州。以后又多次上书要求退休,终于在神宗熙宁四年(1071)以太子少师告老退居颍州,第二年卒于该地,谥“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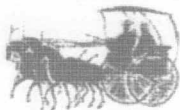
欧阳修不仅是北宋时期的重要政治家,而且也是文化事业上的多面手,我国文学史上开一代风气的重要作家。他擅长诗、词、文、赋各体,著有《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这一文艺评论的新体裁,并在史学、经学、金石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宋·吴充《欧阳公行状》云:“居三朝数十年间,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公之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其得意处,虽退之未能过。”这一评价并非过誉,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在散文和诗歌两方面的成就和影响更值得重视。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富有创新精神。他在同五代以来靡丽柔弱、怪僻艰涩文风的斗争中,着重发扬了韩愈散文中“易”的一面,建立了一种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学风格。后世散文家大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风格。这是欧阳修也是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贡献。关于欧阳修的散文成就、历史地位和影响,苏轼有一段著名的评述:

愈之后三百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六《六一居士集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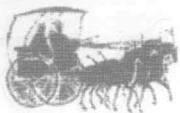
所谓“天下翕然师尊之”,足见欧阳修散文影响之大。所谓“今之韩愈”,足见欧阳修于宋代古文运动功绩卓著。从一定的意



义上讲,欧阳修倡导古文运动获得胜利的过程,也就是他的散文影响当时文风的过程。

虽然欧阳修自己也标榜学习韩愈,但实际并不为其所拘,而是另辟蹊径,自成一家。正如清·袁枚所说:“欧公学韩文,而所作文全不似韩,此八家中所以独树一帜也”。(《随园诗话》)清·刘熙载也认为欧文“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旨趣为多”(《艺概·文概》)。确实,如果说韩愈的散文如浑浩流转的长江大河,那么欧阳修的文章就像微波荡漾的清池曲水;韩愈的文章雄奇奔放,表现出一种阳刚之美,欧阳修的散文则委婉曲折、平易自然,表现为阴柔之美。韩文滔滔雄辩,欧文娓娓而谈;韩文沉着痛快,欧文委婉含蓄。欧阳修继承并发展了韩愈散文文从字顺的正确作法,而避免了韩愈尚奇好异的作风。

在欧阳修的散文里,常常回响着声声悠长咏叹,饱含着一种幽情风神。这不仅表现在抒情文、记叙文中,就是在议论文中也很明显。如《五代史伶官传序》以古鉴今感慨淋漓,写得很有抒情意味。文章起手一提,点出题旨;中间叙事,抑扬有致;最后用两对排偶句式:“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归结出发人深思的至理名言,增强了文章的议论气势。因此,清·沈德潜说它“直可与史迁相为颉颃”。就是像《朋党论》那样精悍犀利、论辩剀切的政论文,也显示了欧文的语言婉转流畅、笔端富有感情的特点。为了辨明是非曲直,文章一开头就从正面切入论题:“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接着,出人意表地提出“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一针见血地挑明其分野就在于“同道”还是“同利”。然后具体申说,曲折往复,婉切周至,引而不发,却能破千古入君之疑。在列举史实以证“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必要性的论述中,在文章“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的结束语里,也都渗透着一种深沉的感慨,悠长的嗟叹,饱含敬“君子之朋”,憎“小人之朋”的强烈感情。正是这种浓郁的情味,使得欧阳修的散文,往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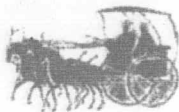


显示出婉曲轻柔、深蕴容与的特点。

欧阳修的散文，无论状物写景，叙事怀人，都写得摇曳生姿，具有较强的感人力量。他的名篇《秋声赋》，多用散文的笔调，通过多种譬喻，描摹无形的秋声，烘托出变化多端的秋天景象，一变辞赋凝重呆滞、了无生气的面貌，表现了他艺术上的独创性。欧阳修对事物细致观察，用心体味，深思熟虑然后融会于心，写成文字，往往能把事物复杂、细微的地方揭示出来。因此在表达方式上，文笔纤徐舒缓，千回百折，从容闲易。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文。《醉翁亭记》写滁州山间朝暮变化，四时不同的景色以及滁人和自己在山间的游乐，层次利落分明，语言自然流畅，表达了摆脱约束、从容委婉的情致。又如《樊侯庙灾记》，虽然主要不是叙事，而是说理，但由于作者对所写的内容烂熟于心，所以在驳斥樊侯神灵降灾之说时，写得环环相扣，有理有据，显得很有说服力，而行文转折不穷，跌宕有力，所以明·唐顺之赞扬说：“文不过三百，而十馀转折，愈出愈奇，文之最妙者也。”（《唐宋八大家文钞·欧阳文忠公文钞》）

欧阳修散文婉曲闲易、妙丽轻柔风格的形成，和用词造句的平易、精美也有很大关系。欧文除了简洁外，突出的一点，就是贯彻“易知”、“易明”的散文主张，在措辞用语上十分平易自然，明晓通畅。这在不事藻饰、朴实无华的《泂冈阡表》、《读李翱文》等文章中有明显的体现，就是《醉翁亭记》、《秋声赋》等比较讲究词藻的散文中也是如此。请看《祭石曼卿文》中的一段描写：“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磷飞萤？但见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嚶。”这段文字真切生动地展示出一幅荒凉凄寂的图画，这和作者选用具有特征性的事物，择取富有色泽、动感的词语，予以细致、精确的描写是分不开的。

欧阳修散文语气纤徐容与，声韵和谐悠扬，当然首先取决于其文气势的旺盛和幽深，但多用虚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宋·罗大经说：“韩、柳犹用奇字重字，欧、苏唯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鹤林玉露》卷十五）的确，欧文中常用轻字、虚词，像鸣



呼、岂、矣、哉、邪、欤等字不时出现，至于“也”字更是常见。《醉翁亭记》中二十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例子，再如《与高司谏书》中就有十个“也”字，《与尹师鲁书》有十二个“也”字。如此多用虚词，造成了欧文咏叹和舒缓婉曲的语气，有助于增强文章的风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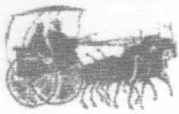
总之，欧阳修的散文叙事简括有法，而议论纡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语句圆融轻快，略无滞涩窘迫之感，又注意语气的轻重和声调的谐和，故苏轼称他为“今之韩愈也”。确实，正像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一样，欧阳修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作为当时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也是毫无愧色的。

创作诗歌，对欧阳修来说是其余事。《六一诗话》有云：“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欧阳修称引韩愈这席话，实为夫子自道。统观《欧阳文忠公集》，诗、词多为外补时所作。

欧阳修少年得志，气宇轩昂，自云“余本浪漫者”，“醉必如张颠”。也许因为个性相近或由于李白诗歌“超越飞扬”易为感动的缘故，李白深得欧阳修的“赏爱”。他“不甚喜杜诗，谓韩吏部绝伦”。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畅。”欧阳修的诗取法于李白、韩愈而加以新变，用一种平易疏畅的风格影响了一代诗风。其古体长篇多效韩愈，设想奇特，笔力豪横，以文为诗而多议论，但又不像韩愈那样故作盘空硬语，在力主“发声通下情”这一点上又与白居易相似。今人钱钟书先生尝谓其“苦学昌黎，参以太白、香山”，“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的畅所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钱钟书《宋诗选注》），可谓独具慧眼。

欧阳修要求诗歌创作贴近现实，抒发真实性情，反对无病呻吟和奇僻怪涩。《赠杜默》诗中有云：

京东聚群盗，河北新点兵。饥荒与愁苦，道路日以盈。子



盍引其吭，发声通下情。上闻天子聪，次使宰相听。

诗从正面规劝杜默要改弦更张，应以关心民瘼为己任。“发声通下情”，是欧阳修明确的诗歌创作主张，与白居易《采诗官》所谓“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是同一个意思。在欧阳修看来，作为诗歌应该而且必须发挥补察时政、劝世救时的社会功能。欧阳修自己正是实践了这种主张，许多诗作能反映出某些重要的社会现实，如《食糟民》反映出作者对官民对立的社会形势的焦虑与不安，《边户》反映出边界人民“两地供赋租”的苦况以及他们对反抗斗争受宋朝统治者压抑的不满。《答杨辟喜雨长句》等诗也是积极干预生活的杰作。

欧诗就总体风格而言，平易流畅。但因体而异，成就也高下不等。近体诗矫正西昆派雕琢之失，用典、议论不多，不尚藻饰，音节工整和谐，用语浅近自然。如七言律诗《晚泊岳阳》：

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正见空江明月来，
云水苍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辉，水上人歌月下归。一阙
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

全诗隐寓着浓重的前程渺茫、漂泊无依的失落感，但从字面上看只写月下江上见闻，化虚为实，更显得空灵蕴藉，意味深长。又如《戏答元珍》，意脉绵密，情致完足，可说是继唐诗之后，蹊径独辟之作。但其近体诗，总的来说格调不高，较为平弱，往往有句无篇。

与近体诗相比，欧阳修的古体诗更有特色，成就也更大，尤以七言歌行体写得最好，所以苏轼说他“诗赋似李白”。如《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全篇反复地出现“春”字，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笔调自然流畅，收放自如，一种深长的叹息和挥之不去的春愁，从貌似旷达的情怀流出，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这是欧阳修诗文的主体风格，也是歌行体的特征。欧阳修学习李白，但不满足于模仿，因而在语言形式上有意把一唱三叹之妙发挥得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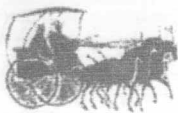


漓尽致，并改李白的飞扬跋扈之气为留连婉转，力求余韵悠长的效果，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正如清·王士禛所说：“宋承唐季衰陋之后，至欧阳文忠公始拔流俗，七言长句高处直迫昌黎，自王介甫辈皆不及也。”（《带经堂诗话》）清·田雯也说：“七言古诗，至唐末式微甚矣！欧阳文忠公崛起宋代，直接杜、韩之派而光大之，诗之幸也。”（《古欢堂集》）

欧阳修七言歌行最主要的特点表现为散文化、议论化创作倾向。清·李调元认为：“欧阳文忠公诗，则全是有韵古文，当与古文合看可也。”（《雨村诗话》卷下）清·方东树也说：“诗莫难于七古……观韩、欧、苏三家，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昭昧詹言》卷十一）检视欧集，以文为诗随处可见，只是七言歌行显得更为突出。前人已经指出他的一些设想奇怪的诗，如《凌溪大石》、《石篆》、《紫石砚屏歌》等，都是模仿韩愈的《赤藤杖歌》（见陈善《打虱新话》下集）。但一般地说，欧阳修诗吸收韩愈的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又避免了韩诗的造语险怪和生僻，因此他的诗语言自然流畅，无韩诗艰涩拗口之弊，风格清新而不流于柔靡，在谋篇布局上表现为或顺题布放，舒卷自如，或往复逆折，翻卷倒插。遣词造句常用语助词、介词入诗，多以关联词语承上启下。夹叙夹议，述论结合，层见叠出。如欧阳修自己的得意之作《明妃曲和王介甫》、《再和明妃曲》，借王昭君的传说故事，不屑拾人牙慧，翻出新意，推出己见。尤其是“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一联与七律《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一联，同样借古讽今，发人深省，从而广传人口。

总之，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既保持了唐诗的格局，又写得比较流利洒脱，清新自然，对扫除西昆派的浮艳诗风，有其良好的作用。尽管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不能与散文相比并，却和梅尧臣等一起为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开辟了道路，宋诗从此初露峥嵘，奠定了“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的基础。

欧阳修不但是著名的诗人和散文作家，而且是一位大词人。传世的欧词有《六一词》（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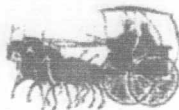
包括写景、抒情、咏史等内容,后者则主要是艳词,中间杂有他人的作品,实存词约 240 首左右。以数量论,超过了在他以前的所有作家;就影响看,也不在欧诗之下。一些学者认为,欧词比欧诗的成就更高,影响更大。

词起于隋、唐,盛于宋代,所谓“秦楼楚馆,竞赌新声”,说的是在都市日趋侈靡的生活中,士大夫们比赛填词作歌的情景。欧词在内容上,亦大多属于“金樽檀板”、“聊佐清欢”之类;但在艺术性上,则继承和发展了南唐·冯延巳一派清隽的风格,摒弃了花间派铺金缀玉、脂香粉腻的习气,表现为清疏隽永、蕴藉深厚的风格特色。

欧词中写男女相悦、密约幽期、宴乐歌舞、惜春赏花之属约占四分之三。欧阳修的诗与文,大都态度庄重,很少涉及儿女私情,但在词里,却更多披露了其生活感情的另一个方面。从内容与风格看,与作为政治改革实践家的身份极不相称,与儒家传统观念也显得格格不入。因此,自南宋以来,不少学者以为欧词中夹杂着重作。如南宋·曾慥《乐府雅词序》就曾指出:“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幼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随后王灼《碧鸡漫志》亦谓:“欧阳永叔所集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间他人数字,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暧昧之谤。”陈振孙也说:“其间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者,亦有鄙亵之语一二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直斋书录解題》)

前人将欧词中的艳词和“浅近”者视为伪作,其实大可不必。这类欧词的产生,其根源在于当时士大夫们的享乐生活和狎妓饮酒之类风习。宋词中描摹“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的,几乎俯拾即是。欧词自然也不例外。他的〔临江仙〕(柳外轻雷池上雨),相传是因所眷官妓遗失一枚金钗,在钱惟演座上为她向“公库”乞偿之作。欧阳修还有不少艳词是恋爱相思的写实,一改严肃的卫道士面孔,表现了文人风流倜傥的格调。最著名的有〔生查子〕《元夕》: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写男女约会，朴实生动，毫不拘谨，与他的诗文相比，判若两人，以至有人误以为是朱淑真之作。又如〔南歌子〕塑造了一位蜜月中新娘子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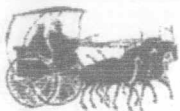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

以通俗亲切的语言和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动作，点画出了新娘天真娇憨的情态。再如〔南乡子〕（好个人人）写情侣幽会的场面；更有〔醉蓬莱〕（见羞容敛翠）一词，具体细致地刻画青年男女于红药阑边艳遇的神情体态，情致缠绵，直率大胆，简直很难想像竟出自欧阳修之手。这类词脱尽铅华，清隽疏朗，与《花间》异趣。再如〔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上阕写“旅人”所见所感，“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下阕写闺中“思妇”的怀念，“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全词构思新颖，情致绵邈，比喻贴切，极尽委婉柔美之致，在当时词坛上堪称上乘之作。

欧阳修还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的词。最有代表性的是十首歌咏颍州西湖风光的〔采桑子〕。其三云：“行云却在行舟下，空山澄鲜，俯仰留连，疑是湖中别有天。”其四云：“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其五云：“谁知闲凭栏杆处，芳草斜晖，水远烟微，一点沧洲白鹭飞。”这些词，于鲜明的形



象中,洋溢着浓厚的诗情画意,格调清新,语言精美,在当时同类作品中,亦属上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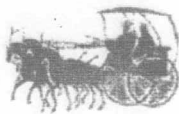
欧阳修的词中,还有一部分感慨遭际、伤时叹老之作。这些词多写于作者两次遭贬之后,更能显示其蕴藉深沉的风格特色。像〔浣溪沙〕:“浮世歌欢真易失,宦途离合信难期,尊前莫惜醉如泥。”〔临江仙〕:“记得金盞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复杂的生活感受,难言的今昔之感,蕴含在深深的叹息之中,言近意远,发人联想。尤其是至和元年(1054)服除,重返京师时所作〔圣无忧〕,回顾庆历新政流产后十年间的切身经历,蹉跎了青春年华,一腔愤懑诉说无门,只得借酒浇愁,于浅直中见深沉,含蕴着作者对人生价值的执著追求。这类词作就数量来看,所占比重只占欧词的四分之一,却有益于拓宽词的题材,得到了时人广泛的重视。南宋初曾慥选《乐府雅词》,以欧词为有宋之冠,绝非偶然。清·刘熙载云:“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艺概·文概》)冯煦又谓,欧阳修词“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宋至文忠,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本传云:‘超然独骛,众莫能及。’独其文乎哉!独其文乎哉!”(《宋六十家词选》例言)可见其在词的发展史上继往开来,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欧阳修是位“蓄道德而能文章”的政治思想家与实践家、经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从政之余,主要精力用于对诗文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革新,以其丰硕的创作成果,显示出北宋文坛的繁荣。欧阳修是当之无愧的北宋领袖文坛的一代宗师!

本书精选欧阳修诗、词、文加以解评、注释。为方便读者使用,未附“欧阳修年谱简编”、“欧阳修研究主要文献”及“《欧阳修集》名言警句”(正文中用着重号标出)。不当之处,敬请赐教。

沈利华 倪培翔

2005年3月10日



欧阳修与诗文变革的完成(代序)

葛兆光

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是在宋代文学总体上处于衰退的情况下产生的。它一面顺应着思想控制强化的时代文化，一面寻求文学的新的立足点和艺术风格。在这里起着中枢作用的是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吉水(今属江西)人，出身于低级官吏家庭，父早亡，幼时家贫。天圣八年(1030)进士，初仕洛阳，与梅尧臣、尹洙等人声气相通，提倡文学变革。景祐初入京后，因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主张被贬，庆历年间，再度积极参与范所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复又长期贬外。至和年间入朝，逐渐上升至枢密副使、参加政事等权要职位。晚年对王安石新法持反对态度，这大抵是因为欧阳修虽主张政治改革，但态度比较稳健，以为王安石激烈变法流弊甚多。有《欧阳文忠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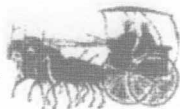
欧阳修在北宋文学变革中的领袖地位，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这一场文学变革作为宋王朝思想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既与当时政治方面的改革相互关联，又是自上而下、依靠政权的力量推进的。早在天圣年间，范仲淹就提出过“时之所尚，何能独变”，希望朝廷“敦谕词臣，兴复古道”(《奏上时务书》)，而朝廷也确实几次下诏，从政治意义上提出改变文风的问题，如仁宗天圣年间曾诏斥文人“竞为浮夸靡蔓之文”，要求学者“务明先圣之道”，并指令从朝廷文件入手“矫文章之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108)。领导这种性质的变革，当然需要相当高的政治地位，而欧阳修具备这一基本条件。

其次，欧阳修在当时的文人群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他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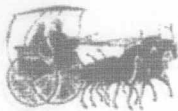
政治活动中表现出的人格修养既为重视道德节操的士大夫所尊重，同时他又喜扬人之美，并利用其知贡举的权力地位举荐人才，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的文学家都曾得到欧阳修的帮助，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集团性的力量，从而更便于扩大影响，推行他们的主张。如梅尧臣、苏舜钦二人名位不显，欧阳修却以诗坛宗主相视，使他们声誉大张；曾巩落第，欧阳修为他写序饯行，令人刮目相待，后又在知贡举时把他录为进士；对王安石，欧阳修不仅两次加以推荐，而且在赠诗中给予极高的称评；三苏中，苏洵以一默默无闻的布衣身份，经欧阳修的推荐和鼓吹而名动海内，苏轼、苏辙则是欧阳修知贡举时选拔于前列的，苏轼尤其受到他的推重。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和政治家，欧阳修的眼光、涵养，确实是不同一般的。

还有一个直接和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欧阳修不仅本人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在诗歌、散文、词的创作方面有特出成就，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还有着比较合理、富有调和性、包容性的文学主张。北宋立国以来，由于约制个性的儒家伦理观念的强化，在文学方面以道统文、以道代文的理论盛张到空前的地步，它虽然触及北宋初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学风气的某些弊病，但对文学生机，却在另一个方向上形成更强的扼制。而欧阳修的态度，一方面对这种占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想在原则上表示赞同，承认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对石介、尹洙等人表示相当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反对过分偏激的主张。他虽说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但也看到有事功、道德的人未必一定能文，“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薛简肃公文集序》）；认为文采还是有其必要的，“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文章（当然是指符合于道的）有着不朽的价值，“英雄白骨化黄土，富贵何止浮云轻。唯有文章烂日星，气凌山岳常峥嵘”（《感二子》）。虽说这些表述较之宋以前文学理论已经达到的成就而言，并没有什么发展，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仍有它重要的意义。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欧阳修的态度要更合理些。譬如对西昆体,他有不少好评,甚至称赞杨亿“真一代之文豪也”(《归田录》),而批评石介对西昆诗人的极端态度是“好异以取高”,“以惊世人”(《与石推官第一书》)。再如对骈体文,欧阳修的持论也较公允。他说过,“时文虽曰浮巧,其为功亦不易也”(《与荆南乐秀才》),“俚偶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并赞扬苏氏父子的骈文“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苏氏四六》),他认为骈文的缺点是在形式的严格限制下造成说理和叙述的不清晰,不畅通。所以,欧阳修所领导的文学变革虽有反对西昆体和骈文的一面,但它的核心问题,其实是怎样使文学在建立完善的社会秩序方面起到更积极更实际的作用。在这个基本前提下,他们维护了文学的存在权利,同时也维护了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活动的价值。

同时,欧阳修他们也抵制了尊崇和效仿韩愈、走向僻怪险涩的文学风气。尊韩本来是欧阳修提出的主张,据其《记旧本韩文后》,韩文的流行同他校定《昌黎集》直接有关。但这恐怕主要着眼于提倡“古文”和发扬韩愈的文学主张,韩文那种个性发露、奇崛雄肆甚至是险怪僻涩的风格,未必为欧阳修所喜好;尤其是,它和宋代的文化风气,和宋人儒雅敛束的个性很难投合。所以欧阳修他们倡导的“古文”,需要走一条不同于唐人的道路。当时有所谓“太学体”(国子学中流行的文体),其代表人物为刘幾,据说其文使“学者歛然效之”(《梦溪笔谈》)。它的面貌现在已无法看到,据《梦溪笔谈》所引片断,有“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之句。倘以韩愈及其周围文人的怪诞之语相比,这实在不算怎么奇特。但欧阳修为了提倡一种朴素流畅的文风,嘉祐二年主持科举时,将刘幾的文章用红笔从头到尾,一下抹倒,“判大纍纍字榜之”,并将“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同上)。这激起举子哗变,群聚嘲骂,甚至在大街上拦住欧阳修的马头哄闹,而欧阳修不为所动,终于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本传)。科举文章与士人一生前途相关,它对社会上文章风格的影响自然不言而喻。



通过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集团的努力，北宋中叶的这一场文学变革终于获得成功，并由此主要在诗、文两方面确立了宋代文学的基本风格。这当然很难加以简单的概括，从大的方面来说，以文而言，是虽以散体为主，实融合骈体，可以说结束了骈体与散体的截然对立，文字以浅易流畅为多，节奏徐缓宛转，较少激烈跳荡的表现（尤其是非政治性的抒情散文）；以诗而言，情感的力度减弱，所反映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相应地色彩和意象都比较疏淡，而对事物观察和体验比前人更细腻，总体上带有重理智的特点，特别在古体诗中，散文化的叙述和说理成分往往占很大比率。

对于这一场文学变革的评价是复杂的事情。概要而言，一方面需要看到它是士大夫集团所倡导的思想文化变革的一部分，是自上而下具有政治意义的行动，它对文学自由发展是有约束作用的；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它有效地抵制了更为极端的道家学家的主张，在时代的限定条件下，孕育了中国文学的一些新的特色，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而且，同历史上的各种文学运动一样，作家的实际创作并不是完全被他们的理论和阴影所笼罩的。

欧阳修本人的诗文创作，在当时也具有典范意义。他的诗中，如《答朱案捕蝗诗》、《食糟民》、《答杨子静两长句》等，都是涉及具体社会问题、有感而发的，并且就此陈述己见，或表示内心的道德自责。他的政治诗的数量并不多，这大约因为他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不同于一般文人急于用诗歌来表现自己。

欧阳修诗中一些古体长篇，好发议论，好铺排叙事，散文化的倾向非常严重，如《洛阳牡丹图》像一篇《洛阳牡丹记》，《吴学士石屏歌》“吾嗟人愚，不见天地造化之初难……”像一篇别扭的古文，《鬼车》以“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开头，中间又有“不见其形，但闻其声，其初切切凄凄，或高或低……”，实在不能算作“诗”了。另外，《打虱新话》指出他的《菱溪大石》等篇系模仿韩愈，这也是和时代风气一致的地方。不过，他很少用生僻字眼、